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本土化 及其重要价值

□ 裴晓睿

摘要:本文从文学译介和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泰文翻译文本洪版《三国》在泰国的本土化过程、影响及其意义。《三国》新颖的小说文体、宏大叙事的历史故事魅力和文学家高超的泰语水平,共同铸就了它在泰国的“国家文学”地位。两百余年以来,各类仿作“《三国》文体”的文学文本和派生文本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著作不断涌现,《三国》文化的价值不断被发掘,影响层面日益扩展。这一现象在文学和文化传播领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三国演义》 《三国》 本土化 文学译介 文化传播

Abstract: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examines the history,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ovel *Sanguo Yanyi*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as translated by Chaophraya Phrakhlang Hon, who did the first Thai version of this novel under the title of *Samkok*. Its classical novelistic style, the charm of the grand narratives of the historical stories, and the writer's superb level of Thai literacy have created the status of the novel as a masterpiece in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of Thailand. During the past two-hundred-some years, all kinds of texts derived from *Samkok* have continuously appeared, as well as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his translated novel have been constantly used,

and its influences have been ever expanding at many different levels. This phenomenon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in the area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anguo Yanyi*, *Samkok*, localiz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三国演义》故事传入泰国的社会历史背景

中国的《三国演义》大约是在 18 世纪中期阿瑜陀耶王朝时,由大批移居暹罗(泰国旧称)的华人传入泰国的。传播经历了从华人社会逐渐扩展到整个泰国社会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播、神庙信仰、戏剧表演和泰文版文学文本四种途径逐步实现的。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三国演义》的第一部泰文经典译本——洪版《三国》[*Samkok Khong Chaophraya Phrakhlang (Hon)*]问世^①。在此之前,《三国演义》的故事和戏剧表演等早已在民间乃至上层社会流传。1685 年至 1687 年间几位西方传教士和外交使节阿贝·德·舒瓦齐(Abbé de Choisy)、Chaophrayawichayin(汉名待考)、达夏德(Guy Tachard)、娄贝雷(Simon de La Loubère)的著作中都有中国戏剧在暹罗王家仪典或王室盛宴等重要场合表演的记载^②。民间的神庙活动和各类节庆场合也有中国戏剧的表演。18 世纪末开始,暹罗成为潮剧在东南亚的演出中心,早期演出的重要剧目之一就是“三国”戏。泰国南部的古代诗体文学作品中对中国戏曲表演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

大戏演“三国”,髯口当胡须。

泰人听不懂,“做”“打”却有趣。

棍棒刀枪剑,虚晃即若离。

我等如上台,劈头何所惧!^③

①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第一个翻译文本是曼谷王朝一世王谕令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的《三国》,本文简称洪版《三国》。昭帕耶帕康(洪)是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两朝重臣,著名宫廷诗人。“昭帕耶”为爵衔,相当于公爵,“帕康”是财政大臣职衔,“洪”是其名字。

② [泰]乃恰里·宛纳里:《中国戏曲在泰国》,载《皇恩荫庇下的华人 200 年》(特刊),曼谷:经济之路出版社,1987 年,第 168 页;蓬潘·詹塔罗南:《潮州戏的由来及在泰国的传播》,载《艺术家》学刊,1983 年 3 月,第 1 期,第 15 页。

③ [泰]宽迪·阿达瓦乌提采:《汉文学对拉达那哥信时期文学和社会的影响》,论文发表于“汉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学术研讨会”,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5 年 7 月 5 日,第 12 页。拉达那哥信时期即曼谷王朝时期。所谓“曼谷王朝”是华人依据拉达那哥信(Ratanakosin)王朝的王都名称“Bangkok”赋予的习惯称谓。

可见三国故事当时不仅是在华人群体中,在泰国人中也已经颇有影响。“三国”戏、“三国”故事以及与“三国”有关的民间信仰逐渐进入暹罗社会,“三国”人物崇拜在华人的民间信仰和仪式文化中得以传承。关公、孔明、张飞、刘备都被作为神祇供奉,其中尤以关公崇拜最为普遍。这种民间信仰起初只是在华人社圈内流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泰人与华人、华裔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他们之间就逐渐接受了彼此的文化习俗。例如,华人神庙和华人家庭供奉的“三国”人物像同样受到泰人的奉祀和崇拜。“三国”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也逐渐被泰人所了解和接受。“三国”文化和艺术开始潜移默化地融入泰人群体。所有这些都为泰文古典小说《三国》的出现和传播奠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曼谷王朝初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较大变迁的时代,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兴起,打开了暹罗与海外国家交流的大门,开阔了上层社会文学创作者的眼界,人们对文学作品兴趣的转移促成了文学功能的转型,“文学从记叙和训谕功能转向阅读和消遣”。“曼谷王朝初期的诗人们似乎理解了文学功能转变的到来”^①,国王御下的诗人们开始热衷于寻求新颖的故事包括外国故事内容作为创作的源泉。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被移植到泰国就具有了适宜的社会土壤。

一世王在这个时期下令翻译《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小说,主观上是文学复兴和巩固政权的双重需要,客观上则适时地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吞武里王朝之后的曼谷王朝建立之初,内外战争和动乱仍然不断。阿瑜陀耶王朝后期战争中被焚毁的大部分文学遗产亟待抢救和恢复。一世王作为靠政变废掉吞武里王而登上王位的国王,需要在各方面为巩固王位和国家复兴作出努力。他下令翻译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和孟族历史故事《罗阁提叻》(意译《伟大的国王》,讲述一个养马人通过奋斗最终成为国王的经历),这正是一世王夺得王位后为巩固王权、赢得战争、安邦定国、复兴文艺所推出的重要举措。《三国》翻译班子的主持人昭帕耶帕康(洪)在为后来的《东周列国志》泰译本《列国》作序,提到《三国》时说:“国王认为从国家利益考虑翻译该书是必要的。”这说明王室积极主持并推动一批汉文学的翻译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在军事方面,据说1776年缅甸将领阿赛温吉(Asaewunki)率军攻打泰国的彭世洛城,时任泰方征战大将军的加克里(Chaophraya Chakri,即后来登上王位的曼谷王朝一世王)和他的兄弟就曾经利用三国故事中的空城计打退缅甸军。^②可见,《三国演义》在泰国的

^① 尼提·尤西翁:《羽毛笔与船帆:曼谷王朝初期历史与文学研究》,派欧(Phraew)出版社,2000年,第3次印刷,第93页。

^② [泰]《三国》前言,曼谷:艺术文库出版社(Silapabanakhan),1972年。

影响和重要意义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所受到的重视也绝非一般文学作品可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的泰文《三国》的问世虽然是在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1782—1809),但第一次出版却是在泰文印刷技术出现之后的四世王时期(1851—1868)。到了五世王时期(1868—1910),教育的普及、报刊的出现才为扩大泰文洪版《三国》的受众范围提供了有利条件。《三国》作为文字文本在泰国社会的传播才从王室贵族等上层群体逐步拓展到普罗大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显现。

二、泰文洪版《三国》本土化特征的形成

泰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诗歌一统天下,散文体作品极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也就是中国清朝的乾隆至嘉庆年间,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被翻译成泰文,分别取名为《三国》和《西汉》。其中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的《三国》以其前所未见的全新文学内容和体式引起轰动,在泰国统治阶层和贵族文人中广受青睐,甫一问世,就被赋予了泰国“国家文学”的地位,其本土化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泰文洪版《三国》的出现,使民间以汉语方言口头传播的《三国演义》故事扩展到泰语文化语境之中。之后,仿效《三国》的散文体文学作品络绎不绝,“三国体”(Samnuan Samkok)在泰国文坛上从此兴起。“三国”翻译的成功,要归功于大诗人昭帕耶帕康(洪)和他的翻译团队。“昭帕耶帕康(洪)是一位勇于冒险和试验并不断创新的诗人。”^①他所处的时代也为他的别开生面的创作提供了机遇。他的文学自觉表现在多部作品的创新改革之中。其中《三国演义》的翻译在文学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的先例,是“散文体故事类”^②最为成功、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曼谷王朝一世王至二世王时期(1782—1824)是泰国古典文学复苏和发展的繁盛阶段。除《三国》和《西汉》之外,还有多部经典文学巨著问世,其中根据外国名著翻译或改写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例如:《罗摩颂》(音译《拉玛坚》)改写自印度罗摩衍那故事;《罗阁提叻》翻译自孟族历史故事;《伊璘》改写自爪哇马来语班基故事。曼谷王朝初期对外国文学的移译和接受是基于时代的需要。从宏观上来

① 《羽毛笔与船帆:曼谷王朝初期历史与文学研究》,第93页。

② 六世王时期的泰国文学俱乐部把泰文《三国》推举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所谓“散文体故事类”实际上就是“古小说文类”。关于此问题的论辩,参见裴晓睿:《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14页。

看,《三国演义》的被移植,是在适当的时机由适当的译者引入了适当的作品。也可以说,由时代需要(政治需要和受众需求)所决定的翻译目的(本土化目标)加上翻译者的高超水平(译者身份)共同铸就了一部经典的翻译文学作品,成就了一段文学和文化交流的佳话。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外国文学翻译文本都能在译语文化语境中实现本土化目标的。大部分文学译著都只是以“翻译文学”的身份存在于译语文化语境中。而泰文洪版《三国》的特殊,就在于它成功地实现了在泰语文化语境中的本土化改造。译本的具体特征举凡有三:

首先是翻译文本的自身特征对泰语受众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文本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三国传奇故事的内容、情节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广阔场景、历史人物的鲜活面貌和古人博大精深的智慧,为泰国文学艺术欣赏、政治军事谋略以及社会生活理念注入了新鲜血液。

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富含哲理,修辞方法新颖,表现了鲜明的译语文学风格,却无一般译语的生涩感。其高超之处在于能把汉语特有的成语、俚语、熟语、对话和叙事技巧等翻译得出神入化,不仅使泰语阅读者享受到新奇精妙的异域文化特色,而且能使之融入泰语文学传统,丰富了泰语的文学语言。像“三顾茅庐”“开诚布公”“不可多得”“车载斗量”“巧夺天工”“老牛舐犊”“多谋善断”“赤膊上阵”“纵虎归山”“赴汤蹈火”“锦囊妙计”等已然成为泰人熟知的常用成语;与此同时,译者也以语义相近的泰语成语替换了原文的部分汉语成语,而不是一律照搬硬译。可以说,在把握文学翻译的变异度方面,洪版《三国》堪称经典。

翻译策略上向本土化的靠拢。

翻译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文学翻译基于翻译目的、译者身份和文化语境的不同等因素,必然出现相异性。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基本属于同质文化,因而减弱了异文化之间的相异度。翻译文本对源文本的改造并不会产生圆凿方枘之嫌。从源文本与翻译文本的比较可以看出,泰文洪版《三国》的译者是按照泰国人的价值观、宗教信仰、认知习惯和文学欣赏习惯对《三国演义》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改造,这对实现《三国》的本土化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对源文本中人物的价值观和信仰理念上做了多处删改:把中国古人理念中的“天意”改为佛教的“福报”“业报”;把枭雄曹操的处世哲学“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改成“保护自己免受人欺,乃人之常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删除不译等。

迎合泰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习惯,文字上避难趋易,删繁就简。在译文语境中很难重现光彩的汉语古诗和典故大部舍去未译;原著全本120回,洪版《三国》减为87章;改变了泰国人难以欣赏的章回体,按照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重新划分了章节;删除了原书后半部分数段大战的内容。

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消解了不易被泰语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外来文化障碍,保留了与泰国文化协调的中国文化元素,使《三国》故事的趣味、智慧、计谋、人物魅力和语言艺术仍能在泰语文学中大放异彩。

泰文洪版《三国》出现之后,通过书籍的传播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字文本有利于传播的稳定与高效,通过读者的阅读、品评和反馈又不断衍生出更多的文字文本。同时其他传播方式诸如戏剧表演、神庙活动、说书等口头传播和民间信仰传播方式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本土化传播场域,《三国》的本土化传播随之日趋完善。

三、《三国演义》在泰国本土化的影响及其价值

泰国是接受《三国演义》影响的国家中唯一动用官方力量组织翻译,并作为泰国“国家文学”介入本土文坛,进而逐步实现本土化的。《三国演义》的影响丰富了泰国的文学形式和内容,直接推动了泰国文学新文类的产生。《三国》文化对泰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三国》在泰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过程。它为后世泰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甚至部分章节如“草船借箭”和“火烧战船”等片段还被选入泰国中学的泰语教科书并沿用至今。此外,后世还有许多三国故事的译本、改写本、仿写本、重写本以及大量的评论和学术研究著作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70余种(金勇博士论文统计,2009年)。泰国人早已把洪版《三国》视为本民族的文学财富,对其中的人物、故事、政治军事思想、箴言警句和俗谚俚语等都非常熟悉。总之,《三国》已经深植于泰国人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成为泰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的泰国文学史著作中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席位。

以下我们从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阐述本土化的泰文《三国》在泰国产生的影响和它的重要价值。

文学层面:

泰文洪版《三国》促成了泰国古小说文类的生成。“三国体”带动了一大批历史小说的不断产生,从而结束了泰民族自素可泰王朝建国以来五百年古典诗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为现代新小说的生成和发展做好了铺垫。这一文学事件在泰国文学发展史和中泰文学、文化交流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和永恒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泰文洪版《三国》在文学创作的目的是内容方面也开创了风气之先。《三国》

问世之前的作家文学,创作目的多是取悦国王,内容基本局限于五大类:训谕、宗教、赞颂、抒情以及王子公主式的爱情故事。作家(宫廷诗人)大多缺乏丰富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作品强调的是诗歌艺术,内容难免单调繁复。《三国》则截然不同,故事本身是一段场景宏阔、曲折复杂的历史叙事,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物原型积淀,艺术构思精巧,人物身份、形象、性情、智谋、武艺各个不同,读之宛若跃然纸上。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新奇之作,反响热烈、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是必然的。

语言风格方面,在文学界形成了独特的《三国》语言风格。洪版《三国》的魅力除了新颖的历史小说文类和故事内容之外,吸引读者的还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这首先得益于原作语言的凝练生动,寓意深邃,修辞方法丰富多彩;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翻译者作为文学大家驾驭语言的高深功力。他们已经成功地把《三国演义》语言风格的精髓吸收并转化到泰语中来,从而丰富了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表达功能。

洪版《三国》之后陆续出现众多派生文本,并掀起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热。

从曼谷王朝一世王到六世王时期(1782—1925),计有三十多部中国古典小说被陆续译介到泰国,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和热烈追捧。这种情况持续了一百余年来。曼谷王朝五世王(1868—1910)执政以后,教育的变革、印刷业的发展、报刊等大众媒介的普及,促进了阅读群体的不断扩大。以泰文经典译本洪版《三国》为源文本的三国故事,陆续出现了多种派生文本,其中有改写本、缩译本或重译本、批注本、重写本、《三国》评论与研究文本等,例如:

改写本:多部《三国》民间剧片段、歌剧《貂蝉计赚董卓》《卖艺乞丐版〈三国〉》《富豪版〈三国〉》《〈三国〉军事战略》《曹操:永恒的丞相》《凡夫俗子版〈三国〉系列》(包括“洞悉孙权”“剖析刘备”“解读曹操”“揭秘孔明”……)等。

缩译本:《新版〈三国〉》(琿回,2002)。

重译本:《新译〈三国〉》(万崑·帕塔诺泰,1978)。

批注本:《批注版全本〈三国〉》(威瓦·巴查冷威,2001)。

重写本:《卖国者版〈三国〉》(冷·威塔雅库,2003)。

评论与研究文本:《忠义之神关羽、刘备和张飞》(莫塔亚功,1980)、《〈三国〉将帅的军事指挥能力研究》(塔萨那西·索玛戈塞林,1986)、《〈三国〉嘉言集》(布朗·纳那空,1989)、《挖掘〈三国〉宝藏》(本萨·沙拉威,1991)、《文学纵览话〈三国〉》(克立·巴莫,1993)、《评〈三国〉人物》(天采·耶瓦拉美,1994)、《管理者版〈三国〉精粹》(本采·西里玛哈沙空,1997)、《〈三国〉与人事管理:刘备军队研究》(察暖·瓦查拉萨古尼,1998)、《〈三国〉政治之国家分裂》(通田·纳詹浓,2002、2005)、《〈三国〉中的CEO》(边萨·库纳功巴提,2004)等。

文化层面：

《三国》文化影响到泰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国》故事及人物丰富了泰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泰文《三国》问世之前，华人神庙中就有对三国人物的供奉和祭拜，其中尤以关公信仰为最。随着泰文文学文本洪版《三国》的广泛传播，泰人也视关公为忠义之神，神庙中祭拜的香火愈加兴旺，家中供奉者已不鲜见，甚至军界、警界高级官员家中也有供奉者^①。

《三国》故事丰富了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突出表现在戏剧、壁画、雕塑等方面。《三国》戏的演出从最初用汉语方言到以泰语演唱，再到当代《三国》政治讽刺剧^②，其表现力和生命力不断增强，影响范围日渐扩大。这一点是任何其他泰国戏剧不可比肩的。壁画主要出现在中式和泰式寺庙内。如曼谷王朝三世王时期曼谷巴瑟素塔瓦寺(Wat Prasertsuttawat)大雄宝殿内的三国故事壁画就有364幅；六世王时期敕建寺院曼谷波沃尼威寺(Wat Bowonniwet)配殿内的《三国》故事壁画，其艺术风格有的是纯粹中国画风格，也有的是中国画和泰国画风格相融合的。此外，寺庙中也有供奉关公等三国故事人物塑像的，如曼谷石龙军路的关帝古庙、檀香路的关圣帝君古庙等。

《三国》文化被泰国政治家、军事家、知识分子视为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的教科书，并运用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战略。泰文洪版《三国》的翻译本身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后来的派生文本、评论和研究著作也多与时政和谋略有密切关联。例如：《〈三国〉军事战略》《曹操：永恒的丞相》《卖国者版〈三国〉》《〈三国〉政治之国家分裂》等。这类话题在当下的报纸等媒体也常有文章发表甚至独辟专栏刊载评论。

《三国》商业文化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来，把《三国》智慧运用于商业领域的著作不断推出，深受市场青睐。例如：《〈三国〉精粹：管理者版本》(1997)、《〈三国〉中的CEO》(2004)等。

由洪版《三国》开创的“三国体”古小说文类带动了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的各种《三国》派生文本和评论、研究著作的不间断涌现，标志着《三国》在泰国社会的本土化过程一直在持续深化，《三国》的社会影响仍在不断增强并向更多的领域延伸。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三国》的研究、翻译和再创作仍然热度不减。“三国”故事、“三国”人物、“三国”谋略、“三国”语言……成为泰国人喜闻乐道的永恒话

① 笔者亲见，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罗哈察拉(Chumphorn Lohachala)上将家中就供奉着祖传的关公塑像，他的家族是泰国军警界高官世家。

② 指1957年以来出现的，以泰国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学生为主体演出的“法政戏”和“救国戏”，借三国故事针砭时弊、抨击独裁政权。

题。事实证明,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们都能从中演绎出新的解读。《三国》成了真正发掘不尽的文学宝藏,它在文学、文化层面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将是永恒的。

综上所述,洪版《三国》作为泰国文学史上汉文学介入的肇始且引起文类变革的标志性作品,为泰国本土文学从古代诗歌向散文为主的近现代文学做好了铺垫。不仅如此,《三国》在当代的文化视域中又被不断重写或重新阐释,进而对《三国》文化从诸多层面上引起新的关注热潮。

四、结语:文学译介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在泰国乃至亚洲的传播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泰文经典译本洪版《三国》的本土化传播更是把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合到泰国文化语境之中,从而获得普遍认同和接受,为中泰文化深层次的交流构架了桥梁,为促进中泰两国从统治阶层到普罗大众之间的多层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文学译介事件的典型性说明,翻译是导致异文化之间文学相互影响的重要媒介。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一流的翻译,完全可以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实现本土化传播。泰国并不属于汉文化圈,但借助翻译文本的流传,使泰国人对《三国演义》的接受和认知程度超越了汉文化圈国家。《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史和本土化过程证明,优秀的翻译文学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向本土文学的转化,它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上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文学译介,着力推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横向交流,无论是近文化还是远文化之间,都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因为,文学是文化传播的通衢大道,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更是彼此加深了解、增加亲近感,进而达到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